

(一) 五元錢和一個紅薯

我的香港留學生涯

作者：金小慶

作者簡介

金小慶是澳門大學數學系特聘教授，研究的領域是科學計算、數值線性代數：特殊線性系統的預處理方法與應用、數值優化以及金融數學。

1982 年的某一天，當時在南京師範大學（南師大）任教的父親，收到了一封來自於香港中文大學的邀請函，請他去那裡訪問講學。父親覺得很奇怪，因為他自己既無海外關係，又與海外院校素無來往。在那個剛剛改革開放的年代裡，這件事對於整個南師大來說也是件稀罕事。因為是出境學術訪問，時任校長還給父親特批了三百元人民幣治裝費，那時一個教授的月薪只有兩百元左右。1983 年 4 月，父親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到了那裡，他才知道了自己受邀訪問的確切原因。

原來早在 1976 年，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前任系主任周法高教授離開香港回臺灣時，對繼任系主任常宗豪教授說了一番話：「我有一位同學，也是我的恩人叫金啟華，品才俱佳，任職於南京師範學院（南師大前身）中文系。如果有可能的話，在適當的時候，一定要邀請他出來訪問交流一下。」父親聽了這番話後，腦海裡立刻浮現出一幅幅畫面，思緒穿越時空，回到了風雨飄搖、兵荒馬亂的 1949 年前後。

父親於 1947 年 7 月從國立中央大學獲得文學碩士^①，當年報紙上稱金啟華為中央大學文學碩士第一人。不久，他就申請了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的博士研究生，並獲得錄取，入學時間是 1949 年秋季。然而在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軍橫



金啟華教授。（作者提供）

渡長江，攻下南京城。從此，父親的人生軌跡就發生了巨大變化。

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共產黨拿下南京後，立刻進行了嚴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時間腥風血雨、人心惶惶，凡是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士，或是有家屬逃往臺灣的人士，都遭受到無情打擊或徹底鎮壓。許多夜晚，在一陣陣刺耳的警笛聲中，一車車的所謂國民黨反動派及其走狗，被拖到雨花台處決，其中一員就是我父親的中學同學，此人曾擔任國民政府南京警備區司令。小時候，我常聽人們說：「雨

花台裡，那些色彩斑斕的雨花石是由革命先烈的鮮血染成的。」其實，真相只有上帝知道。

那時，國立中央大學的主要部分已從南京遷去了臺灣，作為中央大學副教授的周法高先生也隨校去了臺灣，卻陰錯陽差的把夫人王綿與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周世珍留在了大陸。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風頭過後的某一天，我父親與他最尊敬的前輩——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一起去探望王綿與周世珍。據父親後來說，當時她們母女倆已經有幾天基本沒吃沒喝，家裡值錢的東西差不多全賣光了。唐先生與父親知道後，心中充滿同情與悲涼，他倆不宜久

① 註：石潤宏，《金啟華先生傳略》，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作者鳴謝：王衛、徐兆亮、劉璇 / 文字整理。

留，臨走時，父親留下了五元錢給她們，這五元錢夠她倆半個月的生活費了，那可是救命錢啊！從周家回來後，唐先生向南京師範學院提議，暫時將王綿安排在學校圖書館工作，以解決生計問題。直到60年代初，她們



金啓華教授與唐圭璋教授。（作者提供）

母女倆才去了香港與周法高先生團聚。周法高先生自1964年至1976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周法高教授後來成為世界著名漢語言學家，並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唐圭璋先生，被人們尊稱為「唐老」，學富五車，為人正直，他的一生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編撰的《全宋詞》與《全金元詞》，是古典文學史上的兩座豐碑。尤其是《全宋詞》的出版，曾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注意，並寫賀信讚揚唐老的貢獻。唐老不以為意，將賀信夾在書中，此信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中救了唐老一命。在文革中，全國各大專院校中的所有著名教授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或「牛鬼蛇神」，唐老當然也不例外。起初，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抄唐老家時，惡聲惡氣，其中一個激進紅衛兵竟然動手打了唐老。後來，在又一次抄唐老家時，紅衛兵忽然發現了一本舊書中夾有一封信，打開信一看，

見到落款的「毛澤東」三個字，紅衛兵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可是最高指示（如同古代皇帝聖旨）啊！他們嚇得兩腿發軟，「撲通、撲通」跪倒一片，對著這封信，「嘵、嘵、嘵」磕頭如搗蒜，三呼「萬歲！萬

歲！萬萬歲！」紅衛兵認為連毛主席都讚揚唐老的貢獻，那麼唐老一定沒有任何問題了。因為此信的存在，使得唐老平安的渡過了文革的艱難歲月。文革結束後，那個打唐老的紅衛兵居然考上了南師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他原想跟隨我父親研究宋詞，但父親堅決不收他。父親說：「我最厭惡文革中『打、砸、搶』三種人，此人必須為他在文革中的行為承擔後果。那時他動手打了唐老，這小子竟敢打我的前輩老師，因此我不會收他做研究生的！」

父親的香港之行

1983年父親的香港之行，在中文大學作了兩場學術報告，一場的題目是「中國文學史的教材與教學」；另一場的題目是「杜詩淵源論」。第二場報告引起眾多杜詩愛好者的熱烈討論，在提問環節有人問：「請問金教授對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有何評價？」父親答道：「郭沫若的《李白與

杜甫》是文革中的政治產物，當時爲了所謂儒法鬥爭的需要，郭沫若把李白歸爲法家，把杜甫歸爲儒家，對李杜進行了所謂的階級分析，並把杜甫劃爲地主階級。請問一位地主階級人士怎能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名句？開什麼玩笑啊！此書有著強烈的揚李貶杜傾向，很多東西都是郭沫若自己憑空杜撰出來的，毫無歷史依據。可以說此書是一個御用文人秉承上意而胡編亂造之作，沒有任何歷史意義與文學價值！」此語一出，振聾發聵，贏得滿堂喝彩聲。父親對郭沫若非常反感，認爲他奴顏媚骨，雖然有點學問，但其人品卑劣，不值得仿效。父親的香港之行，結識了不少南粵文學界的知名人士，如饒宗頤、羅忼烈、盧瑋鑾等人。之後，他們時常有書信來往，交流學術，賦詩和唱。

父親訪問香港時，我剛大學畢業不久，被分配到南京市幼兒師範學校教書。其實，我在剛上大學的時候，就定下了以後做大學教授的人生目標，走父親走過的路。我覺得做一名大學教授，可以在自己喜歡的領域裡爲人類科學文化事業做出直接貢獻，其意義遠遠大於做一名中學教師。社會上流傳著一種說法：「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像蠟燭那樣，照亮了別人，燃燒了自己！」我既不喜歡這個蠟燭的比喻，也不喜歡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當盡其所能，爲人類社會多做貢獻，哪怕只是微小貢獻。我希望在做教育工作的同時，也能夠讓自己的數學研究成果永垂青史。當然，這是一條艱巨而漫長的人生之路，如果選擇了這條路，那就必須在大學畢業後進一步深造，讀碩士，甚至讀博士。然而，文革後國內才剛剛開始建立博士學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批博士

共十八位在 1982 年才誕生，被人們戲稱爲「泰山頂上的十八棵勁松」。所以出國留學，似乎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離港回寧時，父親給我帶回了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的資料及研究院的招生資料，我仔細閱讀了每一份資料，發現了幾位大名鼎鼎的教授，決定申請中文大學數學系的碩士研究生。按照中文大學的申請規定，我寄上了大學的成績單（我的大學成績很好）及幾封推薦信。推薦信是由南京一帶幾位著名數學教授寫的，其中之一爲中國著名數理邏輯專家——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莫紹揆先生。

關於莫紹揆先生最出名的傳說，當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協助破譯了「日本海軍之魂」山本五十六大將的密電碼。山本五十六，此人因帶領日本海軍偷襲美軍珍珠港而一戰成名，對於這個雙手沾滿美軍鮮血的人，美軍一直想把他除之而後快。機會終於等來了，山本五十六要去前線巡視的電報被莫紹揆先生協助破譯了，起初美軍情報機關不太相信一位當時不知名的中國學者能夠幹出這事，但美軍最後還是採取了相應的軍事行動。在山本五十六乘坐專機前往線視察的路上，美軍派出閃電式戰鬥機攔截，一舉擊斃了不可一世的山本五十六，從此日本海軍元氣大傷，一蹶不振。美國海軍乘勝追擊，很快拿下太平洋海域的控制權，把日本海軍趕回了日本。莫紹揆先生這一偉大事蹟，竟然在文革中被誣陷成「爲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機關服務」，因此他吃了不少苦頭。莫紹揆先生曾與我父親在中央大學同學，他後來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研究數理邏輯，師從數理邏輯大師伯奈斯（Paul Bernays），而伯奈斯是二十世紀數學

領袖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的學生和密切合作者。莫先生育有兩女一男，皆才貌雙全，他的小女兒與我中學同學。莫先生的三個子女都在 77、78 年考上大學，在寧一時傳為佳話。

寄出申請材料後不久，大約在 1984 年春季，我收到了中文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可謂欣喜萬分，但很快發生的事情猶如一盆涼水當頭淋了下來。當我拿著錄取通知書去南京市公安局辦理有關留學證件時，接待我的公安部門辦事員說：「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去香港留學的事。你可以去美國、英國留學，你甚至可以到越南、柬埔寨留學，但你不能去香港留學，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不能幫你辦理！」說完後，「啪」的一聲，就把我的申請文件扔了出來，連再多問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我只好垂頭喪氣的回家了。父母見到我那個狼狽樣子，也無需再問什麼了，一切盡在不言中。

幸福來敲門

那是 7 月的某天下午，天氣極其炎熱。這時有人敲我們家的門，母親心想：「是誰在這種時候來訪？」因為一者天氣太熱，二者心情不好，心裡一陣猶豫要不要開門見客呢？但她轉念一想：「此人在這種高溫天氣下來訪，或許真的有什麼急事呢？」母親開門一看，原來是南師大中文系的蒙老師，當時誰也沒有料到母親的這次開門，竟然是打開我一生的「幸福之門」！

說起這位蒙老師，故事就長了！長話短說吧，他是一位在文革期間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的

人。文革中，蒙老師與我父親一起，被下放到農場勞動。因父親被劃為「革命群眾」，因此其待遇略高於所謂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但父親非常同情蒙老師的遭遇。有一次，分紅薯吃的時候，革命群眾人人有份，而反革命分子只有看的份。父親乘監督的人不注意，塞了一個紅薯給蒙老師，結果被另外一個革命群眾發現了，那人立刻向學校的管理層工宣隊（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打了小報告。當晚就開了一個所謂鬥私批修會，批評金啟華同志革命立場不堅定，同情歷史反革命分子。父親心中明知是誰告發的，他一言不發，靜靜的坐在那裡，聽著那些人狂吠。打小報告的那個人，後來居然爬上了南師大校長的寶座。

蒙老師是廣東人，俗話說「吃在廣東！」只要是廣東人，就沒有不懂美食的。在農場勞動時，蒙老師告訴父親甲魚（南京人稱「老鱉」）是個好東西。那時，南京一帶根本沒人吃這東西，也不知道怎樣吃。蒙老師說吃法很簡單，只要用甲魚配上薑蔥，煲湯喝就行了。後來一段時期，父親經常將一袋袋的老鱉（一袋十幾只）從農場帶回城，配上薑蔥，煲湯給我們喝。其實，那老鱉的土腥味特重，配上薑蔥煮，根本壓不住那土腥味，吃得我們在一段時期內，一見老鱉就頭痛反胃。現在甲魚可算是高檔食物了，據說甲魚可以強身健體，尤其是有益於青少年的發育成長。我的身高後來竄到了一米九二，是不是因為那時我吃了太多的老鱉呢？

那天，蒙老師進門後，與我父親閒聊起來，他發覺父親的心情不好，精神總是不集中，就問：「你是不是遇到什麼麻煩事了？」父親在他的追問之下，才把我申請留學被拒之事和盤托出，哪知蒙老

師說這事他可幫助。父母與我都覺得這事太難了，因為當時中國內地人沒有去香港留學的先例，對蒙老師能否幫得上忙，將信將疑，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吧！誰知道，他真的幫上大忙了，此乃天意也！蒙老師找到了他的一個學生，那位學生時任江蘇省公安部門的主要領導，是一位真正有理想、信仰、抱負，願意為人民服務並解決問題的共產黨員，他在文革中，為了保護國家機密文件，被紅衛兵打斷三根肋骨，也決不屈服。幸運的是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機，江蘇省公安部門的有關領導，認真的討論了我的留學申請文件，並對我們家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發現父親在歷史上同情並幫助過地下共產黨運動。

那是在 1947 年 5 月，由地下黨學生組織發動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席捲全國。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響應號召，也進行了示威遊行，軍警在 5 月 20 號對遊行民眾開槍鎮壓，學生死傷多人，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 520 血案。當時，作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助教的父親，目睹了血案的發生，內心深處非常同情本校學生。他力盡所能的保護學生，把被打傷的學生接回自己家中，給他們吃喝養傷，幫助他們清洗血衣。因此父親也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身處險境而渾然不覺。後來，當蔣中正校長宣布國立中央大學搬遷臺灣時，父親想都不想，堅決抵制遷校去臺灣！記得父親告訴我，遷校臺灣的消息是在中央大學禮堂裡，由蔣中正校長親自公布的。消息公布後，台下一片譁然，爭吵聲不斷！於是蔣校長走到台下的教師群中與大家交談，他甚至走到我父親身邊，輕拍著我父親的肩膀說：「希望你們這些青年

才俊，能夠與國民政府一起去臺灣，共度時艱，重新創立一所高水準的中央大學。」然而父親這次沒有聽從蔣校長的勸諭。那段時間內，雖然國內大事非常繁雜，但中央大學校園內，不時可以見到蔣校長身影，可能他在勸導大家隨校去臺灣吧！畢竟中央大學聚集了許多國內的高級精英知識分子，人才濟濟，而且人才難得啊！但腐敗透頂的國民政府已經失去了民心、軍心，自然就把天下輸給了共產黨。

父親一向對政治毫無興趣，不參加任何黨派，他常說：「政治，就是一群人，鬼鬼祟祟的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幹著那無恥的勾當！」1949 年以後，父親也從來不提自己當初曾同情和幫助過共產黨。被他救助過的地下黨學生中，一些人後來做了高官，有一位就在南京做官，父親也不以為意。在共產黨開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如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人人都需要過關。令父親奇怪的是「關關難過，關關過！」每次運動中，他都沒有什麼大災大難。後來，父親才知道原來在建國初期，共產黨抓到了一個國民黨特務學生，綽號叫「宋胖」，宋胖交待了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監視中央大學裡的學生地下黨活動，他發現金啟華是同情及幫助那些學生地下黨的。眾所周知，共產黨是記恩又記仇的政黨，「有恩必報，有仇必報！」比如在對待共產黨叛徒的問題上，共產黨一口氣就殺了叛徒顧順章一家老少九口人！然而相反，我父親的這個「紅色印記」，使得他成為共產黨某種意義上的「恩人」了……

幾星期後，江蘇省公安機關人員幫我辦理了出境手續，當我拿到出境證時，真覺得難以置信，仿佛

是在做夢。我的幾位兄弟好友知道我成功的喜訊後，真正的爲我高興，同時又非常不捨。因爲香港人是講廣東話的，好友應惠忠的四哥與廣州珠江鋼琴廠有業務往來，他還特別介紹了幾個廣東朋友與我聚會，交談一番。交談完後，我覺得聽廣東話沒問題。後來到了香港，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廣東話。原來那天聚會的廣東朋友講的是帶著廣東腔的普通話啊！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講官話！」

啟程赴港

1984年8月底，我開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國（境）的旅程。由於當時國內的交通還不發達，我計劃先乘火車從南京到上海，再搭飛機從上海到廣州，之後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最後從羅湖口岸出境到香港。當我離開南京時，全家人到火車站送行。記得當火車慢慢開離月台時，我的雙眼開始模糊了，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忍住淚水，勉強擠出笑容，揮手向月台上的父母姐姐們道別，我見到母親轉過身，背著我擦了眼淚，剎那間，我差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男兒有淚不輕彈」，此時此刻的我只能緊緊的咬住嘴唇，猛的把頭調了過去！母親是位性格倔強的女性，不輕易落淚。記得在1976年12月底，雨雪紛飛，我要去農村插隊，母親在送我上車時都沒落淚。那時，她認爲她的兒子還會回來的，還會回到南京這個家的，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而已。但這一次，她覺得兒子是真正的離開她身邊，應該說是離開了這個家，離開了南京，離開了中國大陸！兒子在走向一個未知世界，在那

個陌生世界裡，當兒子再遇到困難時，她也無能爲力，幫不上忙了。當兒子再回來的時候，就是回家探親做客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多年後，當我再回到南京時，已經有了做客的感覺。龍應台在《目送》^②中生動的描述道：「所謂的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她）的緣份就是今生今世不斷的在目送他（她）的背影漸行漸遠。」許多年後，每當我夫人唱起《燭光裡的媽媽》這首歌時，在我腦海中，總是浮現出母親在月台上那漸行漸遠的身影……

火車離開月台後，開始加速，向上海前進。離站不久，我看著車窗外的景色，除了農田還是農田，農田裡有著三三兩兩個農民在幹活，這種景色對於曾經在農村插隊兩年的我來說，一點也不覺得新奇，反而感到淡淡的厭倦。看著看著，我心中突然湧現出一種莫名奇妙的害怕感覺，平生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我真的離家出去闖蕩世界了？這個世界到底有多大？」那時，我也就在國內跟著父母或朋友去過幾個大城市而已，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而香港，屬於境外，對於這個陌生的地方，我心中充滿了好奇與神秘感，在我腦海中湧現出兩幅截然不同的圖畫。一幅畫面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下的罪惡天堂」，在那裡，「黃、賭、毒」泛濫，英國殖民者經常用皮鞭抽打華人的屁股，這就是當時國內書籍與報紙上所宣傳描寫的情形。比如新加坡，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至今依舊保留著這古老而又殘忍的鞭笞刑罰。據說這種刑罰，一鞭下去，

^② 註：龍應台，《目送》，時報出版社，2008。

皮開肉綻，一般人根本經不起三鞭。想到這裡，我打了一個寒顫，仿佛覺得自己的屁股隱隱作痛。另一幅是我父親在訪問香港後，給我描述的「文明禮貌」外加「經濟繁榮」的畫面。但不管是哪一幅圖，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無親無故、無依無靠的地方，我將在那裡怎樣學習與生活？我能成功嗎？能實現自己的數學家夢想嗎？

隨著那個時代綠皮火車的顛簸搖晃，想著想著，我就慢慢的進入夢鄉。剛睡了幾分鐘，在迷迷糊糊的睡夢中，突然想起母親的囑咐：「一人在外，小心謹慎，旅行過程中，千萬不能熟睡，防止行李被盜！」我一下子就驚醒了！就這樣，在眯盹一會，驚醒一下；又眯盹一會，再驚醒一下的返覆過程中，火車抵達上海火車站。那時的火車真慢，從南京到上海花了五個多小時。我表哥在車站等我了，我在表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就飛廣州了。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搭飛機，那時國內的航空事

業剛剛起步，我從未聽說過什麼波音飛機與空中巴士，只有一些中小型客機。我搭乘的飛機是英國的「三叉戟」飛機。第一次聽到三叉戟名字是在小學時，校長傳達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共中央文件，據文件所述，林彪是乘坐三叉戟飛機外逃的。那時流行的政治術語是：「林彪一伙，叛黨叛國，折戟沉沙，死有餘辜。」坐上飛機後，一想到「折戟沉沙」這四個字，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隨著飛機馬達的轟鳴聲驟起，飛機起飛了，我不由自主的在胸口劃了一個十字。人，只有在這種最無助的時刻，才會想起上帝！一會兒，飛機飛行平穩了，從窗口望去，一片無邊無際的藍天雲海，透過雲海，萬里江山盡顯於腳下，我心裡突然激蕩起一股「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自豪感：「我絕不能讓父母失望，我一定要成功，也一定能成功！」……隨著夜幕慢慢降臨，飛機飛進廣東省上空。當時全國剛開始改革開放，而廣東省則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從飛機上俯



香港中文大學全景。(flickr, See-ming Lee 攝)

覽廣州市的夜空，真是華燈璀璨，是一般內地城市絕對看不到的夜景啊！在廣州中轉後，我就南下深圳了。

一到深圳，我立刻感受到了不一樣的社會氣息，一幢幢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廣告牌，路上車水馬龍，衣著摩登光鮮的人們川流不息，一派內地完全見不到的繁榮景象。我有一種《紅樓夢》裡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猜想這可能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了。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樓高二十四層的上海國際飯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中國的第一高樓，也是上海絕對地標建築。沒見過上海國際飯店，就等於沒去過上海。後來，樓高三十七層的南京金陵飯店於1983年建成，成為中國第一高樓。據說當年農民兄弟進城，抬頭望見這麼高的樓，頭上的草帽掉了一地！我到深圳時，樓高五十三層的國貿大廈剛剛封頂，那時人們說這將是中國的第一高樓。當晚在朋友家裡，我洗

了一次熱水盆浴，而在當時的南京，只有在公共澡堂裡才能洗到熱水澡啊！我沒有太多時間了解深圳，因為大學開學在即。

1984年9月6日，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清晨六時許，我動身來到了羅湖口岸，排長隊去香港，過海關入境，大約花了八個多小時。下午四時左右，我抵達大學火車站，正式開始了我的「洋插隊」生活。魯迅先生曾稱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後來，我才發現自己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從內地到香港的自費留學生，不知不覺中開創了中港留學的歷史。如今有成千上萬的內地年輕人去港澳留學，他們是否知道我是他們的開路先鋒並為此而感謝我呢？國家是否也應該頒授一枚「改革先鋒獎章」給我？直到現在，還經常有人奇怪的問我是怎樣開創中港留學的歷史，我答道：「請聽我講一個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五元錢和一個紅薯〉。」 ∞

